

学贵求真创新

——读黄尊严先生的《日本与山东问题》

苏智良

近年来,由于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美化侵略战争和教科书持续改恶,中国史学界的同仁们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强烈的使命感,进一步自觉加强了日本侵华史和日军暴行的研究,并相继取得了一批优秀成果。这其中有宏观的整体性研究,更不乏深入的专题性研究和区域性研究,黄尊严先生的《日本与山东问题》(齐鲁书社2004年8月版)便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有关日本侵华的区域性研究专著。

黄尊严先生长期从事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且收获颇丰。《日本与山东问题》是他继《日本皇宫百年内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也是积十年之功厚积薄发的成果。“山东问题”由1914年日本出兵占领山东而引发,曾是影响远东国际关系的焦点问题之一,中日之间多次交涉且备受国人关注,并最终成为“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之一。但已有著述或因出版时间较早观点认识陈旧,或因资料掌握不全面,多局限于一般性的陈述,缺乏深入细致的理论剖析,难以给人以更深刻的启示。随着资料的不断丰富和研究理论与方法的不断更新,如何进一步深化该课题的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刻的现实意义,也必将有助于推动中日关系史、日本侵华史以及山东地方史研究的发展。

学术研究贵在求真创新,《日本与山东问题》一书即很好地体

现了这两点。真实全面是该书的第一个亮点。作者广泛收集并利用了时人的评论报道及各种调查报告,并充分利用了海内外已公布的档案资料,特别是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依据当年北京政府外交部收藏的中日交涉档案而编纂出版的各种有关中日关系的资料,同时还有鉴别地使用了日文资料及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正是在充分占有资料和广泛吸收海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该书对“山东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全面论证,从而较为真实地反映了这一事件的全貌,并弥补了以往研究中许多较为薄弱的环节。如日本出兵山东的背景、日德争夺胶澳之战的经过、1914年中日围绕着行军区域、胶济铁路、青岛海关等问题进行的各种交涉,日本对青岛渔、盐业的经营与掠夺,鲁案善后交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该书都首次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该书第二个亮点是观点新颖独到,不囿成说。以往的研究由于资料或认识等原因,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不足,作者对此进行了独到精辟的辨驳剖析,并相应地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如关于日本出兵山东的动机和目的问题,日本学界流行所谓“日英同盟”说、“对德复仇”说、“东亚和平”说等,国内史学界也对日本侵略山东的野心以及在整体侵华国策中的地位认识不足、探讨不够,作者深入探讨后认为:日本借对德宣战出兵山东,是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行动,也是其侵华国策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一战的爆发又为内外交困的日本,提供了摆脱困境扩大侵华的良机。这一结论的确令人耳目一新。又如,针对当时中国政府围绕“山东问题”交涉所采取的态度及方针,国内史学界多“以成败论是非”,超越历史条件一味批评苛责。作者以历次中日交涉的事实经过为依据,以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为准绳,对当时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外交方针及其应变措施重新进行了客观理性的审视,从而得出了较为公允的评价。例如,作者在详细叙述和分析了胶澳之战前后围绕“行军

区域”问题中日交涉的事实经过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划定行军区域,并非袁世凯政府甘愿放弃主权,而是日本当局武力胁迫的结果;行军区域在战后未能及时废止,也是由于日本恃强抵赖;二十一条的提出更是日本蓄谋已久的既定侵华方针,而非袁政府措置失当;在围绕此问题的交涉中,袁政府的应变措施尽管软弱无力,以至受到日本方面的恣意攻讦和嘲弄,却无“授人以隙”之过。这种具体历史地分析,有理有据,自成一说,而非人云亦云、苛求于前人。此类新观点,在书中多有体现。可以说,这正是该书的成功与可贵之处。当然,这些观点是否都能够得到学界的认可,还需读者与方家评判,但作者勇于探索、求实创新的治学精神当是值得肯定和发扬的。

(作者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荣维木)

《日本工商资本与近代山东》

2005年12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庄维民、刘大可著的《日本工商资本与近代山东》,56.4万字。该书利用大量第一手中方和日方档案文献与调查资料,分七章系统考察了1876~1945年日本工商资本在山东扩张活动的历史,通过对日本殖民政策与经济扩张,经济扩张与地区社会经济的实证研究,提出了若干新观点和解释。